

万里茶道湖南段的产茶区构成与历史地位



刘颂华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万里茶道是 1689 年至 1960 年期间中国几个南部省份将所产之茶途经蒙古国输送至俄罗斯的一条古代商贸道路。鉴于万里茶道的突出价值和现存的大量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于 2016 年将其确定为“十三五”大遗址^①,2019 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②。这是湖南省继侗寨(湖南、广西、贵州)、凤凰古城之后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第三项。

全球世界遗产名单中,茶类遗产尚是空白^③。全球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茶类遗产仅两项,均分布在我国:一是景迈山古茶园,二是万里茶道^④。由此可知,万里茶道如能成功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将有望进一步凸显我国自古以来的茶业大国地位,亦能为丰富世界遗产名单中的作物品种贡献中国力量。

2021 年 12 月,与万里茶道中国段相关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九省代表在安徽省祁门举行会议并达成共识,计划在 2022 年完成《万里茶道正式申遗文本(中蒙段)》的编制。

在此背景下,我们虽已公认湖南是万里茶道的一个产茶区,但对万里茶道湖南段的具体产茶区构成及历史地位的认识仍非常模糊。而该两个问题对湖南省在正式申遗前遴选重要文化遗产,加大对这些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形成了明显的制约:不了解万里茶道湖南段的具体产区,就不清楚湖南段的重点文化遗产应该在哪些地方遴选;不了解湖南在万里茶道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无法选择能充分反映湖南段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重点文化遗产。有鉴于此,故有必要开展本研究。

一、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的研究概况

之前对万里茶道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中俄、中蒙贸易,从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的。将万里茶道从物质文化遗产角度专门加以研究,始于 2010 年的《茶叶之路(湖北段)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研究》^⑤。曾有陈先枢^⑥等就湖南全省的茶叶史,伍湘安^⑦、何培金^⑧、李朵娇^⑨、卢璐^⑩等对湖南省内相关区县的地方茶叶史进行过研究。至今为止,未见对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具体构成的研究成果。

二、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的判断标准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几于无一县不宜茶。而除三数近洞庭湖之新涨汙地外,亦无处不产茶”^⑪。但是否湖南省的所有区县均与万里茶道相关呢?本文立足于历史文献,就万里茶道湖南段具体产茶区的构成展开研究。

汉口是万里茶道产茶区县所产之茶外售的集散中心^⑫。对湖南而言,汉口是湖南茶外运的主要目的地^⑬,是湖南茶的集散中心^⑭。

汉口输出至蒙古国、俄罗斯的茶叶品种,以红茶散茶、砖茶(可分红茶砖、黑茶砖、茯茶砖、青茶砖)为主,另外还有少量花卷茶、绿茶、花茶^⑮。故在确定输送茶叶到汉口的湖南区县时,既要重点注意直接输送红茶散茶、砖茶的区县,也要将输出花卷茶、绿茶、花茶、青茶的区县统计在内。

综合前文所述,我们判断万里茶道湖南段具体产

茶区的标准是：在来源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多次记载了在万里茶道时期将茶叶输送到汉口的湖南省区县。

三、湖南段产茶区县的构成与分级

输汉茶叶数据散见于诸多历史文献中，我们选择了基础数据最多的四个代表性时期：1903 年（表一）^⑥、1905 年（表二）^⑦、1908—1910 年（表三）^⑧、1935 年（表四）^⑨，对其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综合分析如下：

综合表一至表四的数据，我们发现：曾在万里茶道时期输送茶叶至汉口的湖南相关区县共有 22 个。根据四个表格中的产量，可将湖南段的这些产茶区县分为核心产区、重点产区、一般产区三类。

在各统计时期，安化的产茶数量稳居全省第一^⑩，是湖南段的核心产区；云溪当时属于临湘，如将云溪和临湘的产量总计为临湘产量，则临湘的综合茶产量遥遥领先于除安化之外的其他产区，为湖南段的第二个产茶中心，是湖南段的重点产区；其余区县的产量明显低于安化和临湘，属于一般产区。

具体分类结果见表五。

万里茶道湖南段中，安化的产茶数量稳居全省第一，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明代晚期安化县已成为西北茶市的重要产茶地之一。该时期，来自安化、新化等县的湖南茶已通过茶马古道大规模贩运至西北茶市，并已形成了“汉川茶少而值高，湖南茶多而值下”^⑪的格局。该局面的形成是因为“汉茶味甘，煎熬易薄。湖茶味苦，酥酪相宜”^⑫，湖南茶更适合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日常饮茶习惯。此事可通过明代晚期的原存于安化的《改良茶法覆议碑》^⑬得到印证。该碑刻明示了新化、安化均为茶马古道湖南段的重要产区，两县当时的实际产茶数量大致相当，四川茶商不远千里来到安化通过本地牙行收购茶叶。此时，安化茶需要逆资江而上，先输送至新化的苏溪关进行集散，然后再外运西北。

第二，茶马古道的衰落与万里茶道的兴起导致的湖南茶集散中心的转移。清代早期，因清朝战马的来源已不是问题，茶马互市政策于是逐渐终止^⑭。汉口开埠（1861 年）之后，原来途经陕西泾阳进行集散然后

表一 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县 1903 年输入汉口的茶叶数量

产地	数量(箱)	排名
安化(含涟源)	208250	1(47%)
长沙县	54155	2
湘潭县(含株洲)	40240	3
临湘	38732	4
平江	29473	5
云溪	28900	6
浏阳、醴陵	26000	7
桃源	14352	8
总计	440102	

表二 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县 1905 年产量

产地	产量(两)	排名
安化	150000	1(25%)
云溪	112000	2
长沙县	80000	3
平江	75873	4
临湘	52224	5
涟源	24000	6
浏阳	24000	6
宁乡	20000	8
桃源	18916	9
湘潭县(含株洲)	13619	10
醴陵	12000	11
双峰	10000	12
湘阴(含汨罗)	10000	12
总计	602632	

表三 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县三年间(1908—1910)年均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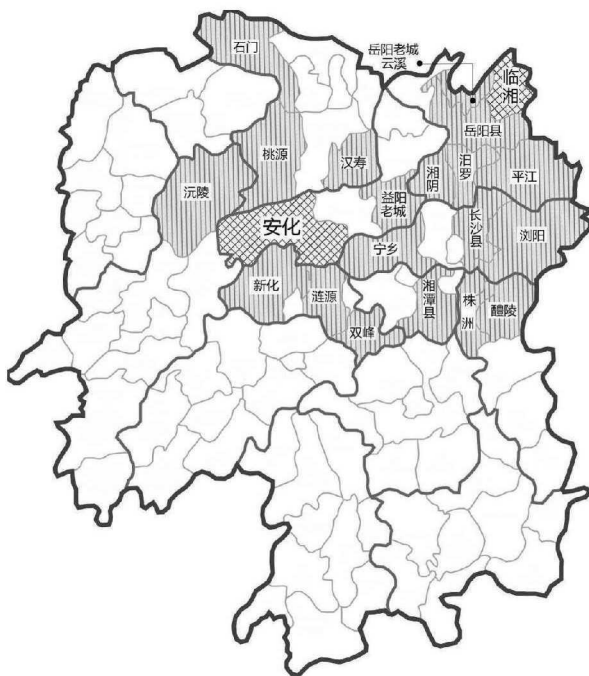
产地	产量(箱)	年均排名
安化(含涟源)	216407	1(44%)
平江	65204	2
湘潭县(含株洲)	49302	3
临湘	42465	4
长沙县	33453	5
浏阳	24992	6
桃源	16457	7
湘阴(含汨罗)	12383	8
云溪	11737	9
醴陵	11391	10
石门	9756	11
宁乡	3583	12
总计	497130	

表四 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县 1935 年产量

产地	产量(担)	排名
安化	42542	1(30%)
临湘(含云溪)	23080	2
湘阴(含汨罗)	15189	3
沅陵	12400	4
新化	10000	5
桃源	7400	6
浏阳	6400	7
岳阳老城(含岳阳县)	6200	8
长沙县	5100	9
汉寿	4600	10
平江	4000	11
醴陵	2380	12
双峰	1000	13
益阳老城	700	14
涟源	590	15
湘潭(含株洲)	260	16
宁乡	200	17
总计	142041	

表五 万里茶道湖南段产茶区县的构成

分类	数量	区县
核心产区	1 个	安化
重点产区	1 个	临湘
一般产区	20 个	云溪、平江、长沙县、桃源、浏阳、汨罗、湘阴、株洲、湘潭县、醴陵、岳阳老城、岳阳县、宁乡、石门、涟源、双峰、新化、益阳老城、沅陵、汉寿



图一 万里茶道产茶区县分布图(湖南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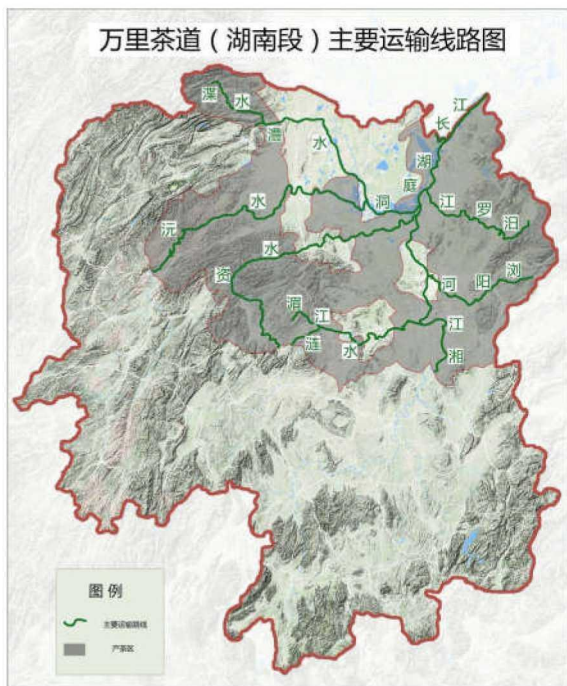
再销往新疆等地的湖南茶改为途经湖北汉口进行集散。安化茶由原来的逆流至新化苏溪关集散改为顺流至汉口进行集散,限制安化茶大规模外运的交通瓶颈不再存在,加之原来安化茶原来已在北方茶市建立的良好口碑,于是安化一跃而成了湖南段的主要产茶区。

“湖南茶之输送于汉口,概系民船。其积载量不能一定。”^⑨根据前述 22 个产茶区县县的地理位置,可知湖南茶均主要通过这些产茶区县的大型河流、经过长江用船只顺流输送到汉口。因为安化是万里茶道湖南段中的核心产区,所以万里茶道湖南段茶叶外运的最主要运输线路为:安化——资水——湘江——洞庭湖——长江——汉口^⑩(图二)。

四、湖南段在万里茶道中国段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历史文献中所见的万里茶道湖南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施兆鹏从历史文献和文物这两个角度出发,曾对湖南茶文化的历史地位进行过论述^⑪,但未对湖南在万里茶道中的历史地位进行相关评议。约自唐代开始,湖南的衡阳衡山、岳阳君山、安化渠江等多个地域所产之茶的名声已传播到省外。这些产区,历经宋、元、明、清代,有一些成为万里茶道湖南段的产茶区。如万里茶道湖南段的重点产区——临湘县,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专辟“王朝场”用于大规模种茶和集散,将茶叶大规模输出至北方。万里茶道湖南段的核心产区——安化县早在明代已大规模将黑茶输出至西北,



图二 万里茶道湖南段主要运输路线图

无怪乎明代晚期的汤显祖作《茶马》诗云:“秦晋有茶贾,楚蜀多茶旗……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万里茶道可分四期:初始期(1689—1728 年)、发展期(1728—1861 年)、全盛期(1861—1902 年)、衰退期(1902—1960 年)。该商道上运输的茶叶,均产自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省。在初始期和发展期,受制于相关历史文献的缺乏,暂无法了解万里茶道各产茶省份的数量、茶叶单价比较情况。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之后,恰克图茶叶贸易的主要茶源地,从原来的福建茶转为两湖茶^⑫。到万里茶道的全盛期和衰退期,因各地所产之茶云集汉口,加之报刊业也发展起来,遂开始有了相关可资比较的记载。现按年份对相关主要史实进行分析:

1881 年《申报》记载:

本年汉口茶市,以湖南之桃源茶为第一,安化次之。宜都、宁州又次之,羊楼峒、崇阳、通山为最次。然虽分三等,而客之获利与否仍不可同日而语。若湖南之聂家市、醴陵、湘潭并江西之河口茶斯为最下……计桃源顶盘到三十四两至三十八两、河口茶二十两至十四两、聂家市十一二两、湘潭九两有奇。^⑬

由此可知,就该年的茶价而言,湖南桃源和安化最高。湖北宜都、江西修水次之。湖南临湘、醴陵、湘潭县、江西的河口茶再次之。

1895 年《申报》记载:

两湖红茶,连日共到三十二万四千零四十六件……安化茶价售三十四五至廿七八两,高桥茶价十七八两,崇阳茶价二十两零,湘潭茶价十二三两,聂市茶价十七八两,长沙茶价十六七两,醴陵茶价二十两零,羊楼

峒茶价十三四两,通山茶价十七八两,温州茶价二十七八两,祁门茶价四十两零,宁州茶价四十两零至五十两,外河口茶价三十两上下。^⑧

由此可知,就该年的茶价而言,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最高。江西河口、湖南安化茶次之。湖南的长沙、湘潭、临湘、醴陵,湖北的崇阳、赤壁、通山茶较低。

1896年《申报》记载:“汉皋一镇,为茶商荟萃之区。本岁茶客之驻庄各山者,推安化为首。”^⑨可知该年在汉口集散的茶商去多个产茶设庄收购,其中到安化去的茶商最多。

1898年《新闻报》记载:

近又有安化茶运至汉口者。较祁门尤旺,色香味俱美。计价:物华四十六两、奇品四十六两、长茗四十二两、花仙四十两……共4721箱售于顺丰洋行者。乾孚四十两、瑞芽四十两,共1132箱售于柯化威洋行者。春茗四十两、瑞芽四十两,计317箱售于协和洋行者。又,通山茶声远,二十六两五钱。羊楼洞茶:天声三十三两,香兰三十三两、和记三十三两;崇阳茶:奇尖三十二两五钱、天珍三十二两二钱五分、春香三十二两、奇声三十二两二钱五分。共1432箱售于百昌洋行者。^⑩

该年,湖南安化的茶价超过安徽祁门茶,湖北崇阳、赤壁、通山茶价约为安化茶价的80%。

1898年《湘报》记载:

数日以来,湘省各路新茶均已接次到汉。安化头字前已售价四十六两,现到二字仅售二十七两。浏阳天福昌亦仅二十三两,咸临吉及西乡各号均二十一两。平江杨经纶二十四两,长寿生记二十六两,湘潭十九两。鄂之羊楼洞等处所产现已赶到,其售价自二十七八两至三十五六两为率。^⑪

此时湖南安化的茶价最高,湖南浏阳、平江、湘潭的茶价比湖北赤壁要低。

1898年《湘报》记载:“俄人向销两湖之茶,今则舍两湖而图外洋购办矣。”^⑫可知此时,俄国茶商的茶源地,由原来以中国两湖茶为主,变为同时开始在印度等其他国家购买茶叶了。

1899年《湖北商务报》记载:

今请就运归汉口销售之洋庄茶,除宁、祁另办外,统计两湖产茶之多少,拟定数目,设立茶票。由商人纳资领票,方准向各该地方开办。如湖北拟票:羊楼洞二十张、崇阳十余张、最家市二十张、咸宁十张、通城宜昌各一二张。共拟设票九十余张。湖南拟安化八十张、高桥二十张、长寿二十张、浏阳湘潭各十余张、平江十张、桃源八张、醴陵六张、浏山(待查)湘阴各三张、衡山一张,共拟设票一百九十余张。^⑬

由此可知湖南、湖北两省销往汉口的茶叶数量:湖南安化一家独大,遥遥领先。湖北的赤壁,湖南的临湘、长沙县、平江的销汉茶叶数量次之。湖北的通城、

宜昌,湖南的湘阴、衡山则很少。

1900年左右,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奏疏中称:

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湘、鄂产居多,闽、赣较少,向为晋商所运。^⑭

此时的汉口销俄茶叶,从产量而言,湖南、湖北最多。福建、江西较少。此条信息中未提及安徽,推测该省此时应是万里茶道产茶省份中输汉茶叶数量最少的。

1904年第2期的《国民日报汇编》中称:

按:中国扬子江以南诸省,地多宜茶。其产自闽浙两广云贵等省者,俱由上海、福州、广州、蒙自等处出口,为数约百余万箱。其产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者,皆运往汉口,以汉口为中外互市之所。合计四省产茶之数,不下七八十万箱。而湖南一省,已有四十余万箱。其中红茶、绿茶、砖茶、番茶、粉茶具备。论出数则以湖南为多,论茶味则以江西、湖北为胜,论价值则以江西、安徽为高。^⑮

此时,江西和安徽的茶叶价格最高,湖南茶叶销量最多。

1910年,陆藻在《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中称:

查:汉口茶市,合四省之茶,计之其销数,以湖南为最多,湖北次之。江西之宁州、安徽之祁门又次之。其价值,以安徽祁门茶为最昂,江西宁州茶次之,湖南安化等茶又次之,湖北茶则更次焉。^⑯

此时的汉口茶市,以茶价而言,安徽祁门茶最高,湖南安化茶较低。以销量而言,湖南销量最大,湖北次之,江西、安徽又次之。

1911年,张寿波描述此时的汉口茶市:

汉口以红茶为大宗(外国称黑茶 TEA BLACK),其出产地分两湖、江西、安徽四省。而以安徽之祁门、江西之宁州、湖南之安化为上品。湖北以鹤峰州之品为上,然所产不多,故未甚著名。^⑰

此时茶价,仍以安徽祁门最高,湖南安化茶为第一梯队中较低的。湖北鹤峰茶因其品质开始闻名于市场。

1917年,《安徽实业杂志》对汉口市场上的安徽祁门茶与江西宁红茶进行了对比:

安徽祁门茶,品质甲于全球。秋浦毗连祁门,西人亦名祁茶。江西之浮梁红茶,因与祁门接壤,亦曰祁茶。赣之宁州,本著名产茶之区,奈何以老树过多,不知培旧添新,质味淡薄,西人贬之,茶价一落千丈。故祁茶转在宁茶之上。两湖茶质,向不及皖赣。出产较多,而价格复低。^⑱

由此可知,安徽秋浦(今贵池)、江西浮梁之茶,亦以安徽“祁门茶”之名义在汉口销售。江西宁红茶价不及祁门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茶树老化导致的茶味寡

淡。

1931年,赵烈对当时的茶叶市场进行了总结:

祁宁茶,产于安徽祁门一带,及江西宁州一带。以上各种,皆为红茶。徽州府属六县中,除祁门一县外,其余五县所产之茶,总称曰徽州茶。祁门所产者为红茶,概移出于九江,汉口以行交易。而此五县,则为绿茶,俱集于上海……屯溪茶,徽州茶之别名也……祁宁茶品质远出于两湖茶之上,故其价格亦最高。^⑩

此时,安徽祁门红茶、江西修水红茶俱在汉口销售。安徽其余各县所产之茶为绿茶,俱在上海销售。汉口茶市上的安徽、江西茶价,较之湖南、湖北茶仍是最高。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汉口茶市,湖南茶占十分之六以上。湖北茶占十分之三以上。以红茶及砖茶为主,大都运往苏俄”^⑪。此时的汉口销俄茶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销俄茶叶的来源,虽然仍以湖南茶为主,但江西、福建、安徽茶叶已基本不在汉口销售了。

前述大量相关历史文献,均反映了万里茶道湖南段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湖南段是汉口开埠(1861年)之后万里茶道的茶叶主产区。湖南各地所产之茶,数量以安化最多。绝大多数时期,汉口茶市的安化茶价是最高的之一,时称“清香厚味,安化茶不亚福建武夷山茶”^⑫。发展到万里茶道的衰退期,汉口所售之茶,超过半数来源于湖南。

(二)对万里茶道湖南段历史地位形成原因的分析

吴觉农曾于1935年就湖南外贸茶兴起的原因、太平天国后湖南成为汉口输俄茶市的主要产地进行了分析^⑬。他认为:湖南外贸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广州的茶商无法满足英国茶商的需求,遂深入湖南传授红茶制作技术,将湖南培养为广州茶市的红茶供应基地。自汉口开埠之后,因俄商自行在内地设厂制茶,茶叶贸易中心内移至汉口。湖南因天时地利之便,迅速发展为汉口茶叶的主要供应区。

笔者完全赞同此观点。具体而言,湖南的“天时地利”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第一,运输便捷。湖南紧邻汉口,“湘茶转运近捷”^⑭,湖南产茶区县将茶叶输送至汉口,全部是通过长江或其支流顺流而下,速度很快,运输成本很低。较之万里茶道的其他四个产茶省份,仅湖北省产茶区具有类似优势。万里茶道其余三省(江西、福建、安徽)所产之茶,均需逆长江水流才能运输至汉口。

第二,良好的茶业技术基础。前文已述,湖南省的两个最主要的产茶区县——安化、临湘均长期以来大力发展茶业,县境之内茶园遍地,大多数人以茶为生。在茶价合适的情况下,能迅速普及茶树种植,动员大量人力进行茶叶采摘,有足够的技术人员进行毛茶的制作。

第三,安化县的示范效应。安化自明代以来全境产茶。由前文已知,该一个县的产量就超过了湖南省的三分之一。其位置,是湖南段产茶区县中距离汉口最远的地方之一了。安化茶船一路顺着资江、湘江、洞庭湖、长江,最终到达了汉口。安化县大量的从业人员都因茶致富。在安化的示范效应之下,安化茶外运之汉口的沿途各县,只要是地貌属山地,适合种茶的,几乎都成了产茶区县。

注释:

①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文物保发[2016]22号),见于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 http://www.sach.gov.cn/art/2016/11/22/art_1326_135145.html。

②《关于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函[2019]250号,2019年3月11日。

③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hc.unesco.org/en/list/>。

④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

⑤李百浩等:《茶叶之路(湖北段)文化资源调查与研究》,2010年。转引自宋奕:《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⑥陈先枢、汤青峰、朱海燕:《湖南茶文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⑦伍湘安:《中国安化黑茶》(上、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⑧何培金、何云锋:《千古茶乡聂市镇》,湖南地图出版社,2014年。

⑨李朵姣:《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业史研究》,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⑩卢璐:《明代至民国时期安化黑茶茶叶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⑪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1卷第4期。

⑫《汉口与茶之关系》,《国民日报汇编》1904年第1期,第12页。“推汉口之茶业隆盛之原,当头一棒不外乎俄罗斯。何以故?俄罗斯者,茶之大顾客也。当清之康熙、乾隆年间,俄人已购求中国之茶。”

⑬傅角今:《湖南地理志》(1933年),第13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汉口茶之输出,湘茶几占其三分之一。”

⑭卓君:《华茶出口概略》,《申报》1927年7月28日第18版。“我国各省几皆为产茶之区域。惟数量有多寡,质量有高下而已。其出口之集中,不外汉口、上海、福州三处……宁州、祁门、安化、崇阳、通山、醴陵、沙坪、桃源、高桥、湘阴、羊楼峒、浈山、浏阳等区域之茶,必皆集中于汉口,然后分运于各邦。汉口之出口华茶,以红茶及砖茶为主体。而输出之目的地,除少数输往英吉利外,大都运往俄罗斯……自世界最

长之西伯利亚铁道告竣后,汉口茶商益形发达。以由水路运至海参威,则循西伯利亚铁道而直捷运入俄罗斯。”

⑮ [俄] 阿·科尔萨克著,米镇波译:《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第20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⑯《汉口与茶之关系》,《国民日报汇编·实业》1904年第1期,第9~13页。

⑰ [日] 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第169~170页,武汉出版社,2014年。

⑱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第七章·物产》,第11~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原件现存于武汉市档案馆。

⑲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1卷第4期。

⑳ 今日涟源市全境一半的区域,在万里茶道时期属安化,时均为产茶区。

㉑ 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第1305页,中华书局,1974年。

㉒ 安化县万里茶道申遗办公室:《万里茶道安化段碑刻集成·茶政卷·茶务章程碑(道光十七年,1837)》,第4页,2018年7月,内部资料。原文记载于《山林杂记》(明代,林之兰著。嘉靖至崇祯年间人。古籍现藏湖南省图书馆)。相关内容为:“如往年申详道府移文益阳盘验,国税稍敷。迩来废弛,遂致亏额。今卑职酌议于敷溪(按:今安化县小淹镇敷溪社区)立关盘验……年来(按:天启年间)加派无已,民命罔堪。如辽饷(按:万历四十年1612开征)未已也,而继之以蜀;蜀饷未已也,而继之以黔。日新月盛,财尽民穷。欲诉免则无以应庚癸之呼,欲强支则难免剜肉医疮之苦。今查得新化茶税每岁三千七百有奇,敷额之外,尚欲哀余税以助饷。此岂有神输鬼运之术乎?不过有每月初二、十六苏溪称验(按:新化苏溪关设税卡查验)之一法耳。本县之茶亦不减于新化,本县之税只二百零二两耳,乃年年亏额,其故云何?以称验之法未立,缴票之法未行,故经纪、埠头得以任意包侵、任意走漏也。与其以国课而充滑橐,孰若哀余税以助军需之为便耶?合无仿照新化称验事例,每年请委本县属官一员,每月初二、十六日前诣敷溪称验……权量之谨,自古重之。每斤以十六两为准,此定例也……乃各经纪利于招客赚用,私置每斤二十四两重秤,名为“茶秤”,只图悦客,不惜害民。囤贩假茶,肯依重秤则尽为通行;里递真茶,不从重秤则皆阻塞。其受害更甚。今恳天恩,严颁宪令,以后经纪带客买茶,一体通用正十六两广秤。价值斤两看茶粗细定数。其各牙原置重秤尽皆弃毁。如有再用重秤买茶、不肯遵用广秤者,容各递指名告究,毋容网漏吞舟也。伏候宪裁。前件该知县蒋覆:看得秤以官颁法马较定订造。每斤十六两,此定额也……本县自川商通行之后,各牙设厂囤贩”。

㉓ 孙华:《“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12年第1期。

㉔ 陈泽涵译:《湖南茶业调查书(续)》,《时报》1913年7月12日第10版。

㉕ 刘颂华:《〈资水滩歌〉反映的“万里茶道”遗产线路》,《万里茶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9年。

㉖ 施兆鹏:《论湖南茶文化的历史地位》,《茶叶科学》

2005年第1期。

㉗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第113页、第11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㉘《茶市情形》,《申报》1881年6月11日第1、2版。

㉙《汉皋茶市续闻》,《申报》1895年5月25日第1版。

㉚无题目的短消息,《申报》1896年5月11日第2版。

㉛《安化茶价》,《新闻报》1898年5月30日第1版。

㉜《两湖茶价》,《湘报》1898年第93期,第371页。

㉝ 许崇勋:《论湖南茶务急宜整顿》,《湘报》1898年第67期。

㉞《湖南职商蒋泽湘条陈两湖茶务十二事》,《湖北商务报》1899年第37期。

㉟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奏疏1),第17页,岳麓书社,2013年。

㊱《汉口茶》,《国民日报汇编》1904年第2期,第10页。

㊲ 陆藻:《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第8页,1910年。

㊳ 张寿波:《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第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

㊴《民国六年上半期安徽红茶与赣湘鄂茶汉口市场逐月比较统计表》,《安徽实业杂志》1917年续刊第7期。

㊵ 赵烈:《中国茶业问题》,第12页,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㊶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第765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

㊷《湖南茶产概况调查报告书》,湖南茶事试验场刊物之十,第9页,1935年。

㊸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杂志》1935年第1卷第4期:“当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前后,英人之在粤南之对外贸易,已有相当进展,时输出品以茶为大宗。两粤茶产不多,爰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此为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至同治(1862)以后俄商已在中国自行设厂制茶,汉口渐成我国茶市之中心。湖南以天时地利之便,茶产乃逐渐发展。当1898年时,乃占汉口出口茶总额七分之二。且湖南茶不仅为对英俄两国茶业贸易之重心,又为运销内外蒙古及西北之中枢。”

㊹ 谭嗣同:《浏阳麻利述》,《农学报》第12卷,光绪23年(1897)9月。

(责任编辑:刘慧中)